

Oriental Studies

東方研究

2007

东南亚研究专辑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

Special Issu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經濟日報 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001

第一部分:文化传统研究 001

东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传播过程中的双向互动性(梁志明)/003

中国“和为贵”传统文化与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从朝贡—宗藩关系
和郑和下西洋谈起(梁立基)/017

东南亚国家初期民主制被威权政治取代的原因(罗 杰)/032

论越南人的姓氏(孙衍峰)/041

俚语与缅甸文化(杨国影)/059

印度文化在越南的影响(咸蔓雪)/067

阿拉安—芒扬原住民看待神话的心理态度(史 阳)/075

菲律宾的中国风(黄 轶)/085

印度尼西亚哇扬戏的发展与创新——以爪哇皮影戏为例(郝莉莎)/092

第二部分:文学传统研究 101

越华文化传统与文学交流——兼论越华禅师与文学之关系(刘介民)/103

权力话语与文学形象的古今衍变——解析泰国文学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形象
(裴晓睿)/118

《三国演义》在印度尼西亚(张玉安 黄跃民)/125

《玛杜达玛莎意》:自主的选择(林 琮)/133

谩论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流传与影响(夏 露)/145

佛教对越南古典文学的影响——以《金云翘传》、《宫怨吟曲》为例(谢 昂)
/155

浅析《马来纪年》中的神话与传说(傅聪聪)/165

文明冲突中的爪哇民族精神——印度尼西亚名著《人世间》中的人物形象分
析(骆永昆)/181

《帕罗赋》中的“情味”(裴晓睿 熊 燃)/190

浅析《帕罗赋》中的象征意象(闫 敏)/201

伊富高史诗《呼德呼德》研究(赵 嵩)/210

第三部分:宗教文化研究 229

印度宗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梁立基)/231

感受与体验:宗教和道德的关系——以《罗摩衍那》文本为据(张玉安)/243

缅甸佛教信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管窥(姜永仁)/253

越南《李-陈诗文》与佛教文化(赵玉兰)/263

泰、缅、柬三国政治文化中的佛教因素(罗 杰)/273

印尼伊斯兰教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作用(梁敏和)/285

马来世界的伊斯兰化进程(许利平)/300

扩张与冲突:菲律宾伊斯兰化运动的历史(史 阳)/307

儒、释、道在越南传播的特点(王 彦)/318

菲律宾天主教对政治的介入(吴杰伟)/328

◎ 东南亚国家初期民主制被 威权政治取代的原因

罗杰

在有关东南亚国家民主制度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倾向于关注选举程序安排、选民投票率和选举过程中有无贿选或黑金政治；而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则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议会里议席的分配、政党政治中的相互杯葛或候选人的竞选方针以及是否有腐败劣迹等。对于民主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往往从现实出发，很少回顾民主制度的由来和初建期。笔者认为，民主制度在东南亚国家是不折不扣舶来品，民主程序的建立、破坏、重建虽然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不代表民主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东南亚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民主文化的培育固然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然而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民主制度自从在东南亚国家最初出现开始已经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本文对泰、菲、马、新、印尼等五个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追根溯源，考察这些东南亚国家民主制的最初建立者、民主制初建时的社会条件、民主政治的最初形态、民主化初始阶段的动力和民主制度运行的初期状况等，更尝试分析民主制度最早在东南亚国家出现以后被迫中断、停滞和被威权政治取代的原因。

① 对东南亚国家民主制度初建阶段的多角度考量

东南亚国家最初的民主制度是由这些国家独立初期的统治集团或西方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其中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民主制度的最初建立者是侵占和开发这片土地的西方殖民者。“由不同的殖民国家所推行不同政策已极大地扩大了原来在东南亚社会就已经存在的差别。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些国家在当代政治发展中的差异，简要地考察一些殖民政策的差别是十分重要的”。¹这一时期

¹ 卢西恩·W. 派伊：《东南亚政治制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民主制度来自殖民时代的政治遗产，因此这三国的民主制度可以称做“继承的民主”。宗主国在殖民地进行的政治改革完全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如果说这些改革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那也绝对不是殖民者的初衷，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后果而已。事实上殖民者遗留的政治遗产中还有“分而治之”、“种族隔离”等类似的内容，这些都成为这些国家后来民主化以及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在马来半岛最为突出。不同的殖民地宗主国影响也不相同，比如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就具有非常强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色彩，与西班牙时期封建色彩浓重的重商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以前英国人在马来半岛建立起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三种殖民地政体，进行了模拟宗主国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虽然保留了多位苏丹的王位，然而实权却在英国政府派驻的驻扎官手中。有的东南亚国家曾经不只是一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然而这并不代表对其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一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那个殖民地宗主国，在这方面菲律宾可以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

也有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这些国家获得民族解放之后由本国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例如泰国和印尼就是在国家拥有独立主权的情况下采用民主制度的，都是统治集团有意为之的结果，可以称做“移植的民主”。然而两者又有分别：前者经历过漫长的统一封建国家阶段和由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蒙国王改革”及“朱拉隆功改革”后，1932年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过程符合所有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只是从西方借鉴了一种政治体制而已。追根溯源，这种借鉴仍然和《鲍林条约》签订后西方的影响有关系，其形式类似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印尼的民主制是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有些类似菲、马、新三国的经验，但是统治印尼三百多年的荷兰殖民者并没有像英国殖民者在马来半岛所做的那样对印尼当地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因此印尼没有一笔政治制度方面的殖民遗产可以继承，必须自己去摸索一套政治制度的新样式，这也是后来印尼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诸如总统和国会关系不易理顺等原因之一。“如果考虑到1950~1957年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面临的形势，那么民主实验遭到了失败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那里缺乏建立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印度尼西亚从荷兰人和日本人那里继承了一个警察国家的传统、傲慢和法律结构。印度尼西亚群众大部分是文盲，贫穷，习惯于独裁主义和家长制统治，并且散布在广大的群岛上，他们几乎不可能迫使雅加达的政治家们考虑他们的事情……像代议制民主这样罕见的植物在这样的土地上

简直是无法成长的。”²

无论建立者是谁，民主制在东南亚国家最初建立时的社会条件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利的因素，民主制的建设与发展犹如一个无过往经验可借鉴的“民主实验”。对于菲、马、新、印尼来说，它们不得不在努力摆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同时开始摸索自己的民主制建设之路。泰国也要时刻小心在英国控制的印度、缅甸、马来和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间保持自己的平衡与独立。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上广泛散布着封建苏丹制的小国，是非常典型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菲律宾和泰国虽然都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但是菲律宾的“马洛洛斯共和国”由于美西战争并没有存留到政权巩固的阶段就夭折了；而泰国则于1945年8月6日建立自由泰政府，1946年著名民主派领袖比里出任总理并通过新宪法确立了多党民主制，到1947年11月披汶政变上台就宣告中止了，其军人势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当时东南亚国家中最强的。

可见，民主制在东南亚国家建立起来以后面临着并不有利的现实成长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呈现出相当不同的具体样貌。泰国和马来亚联合邦都采用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前者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而向封建王权进行了妥协；后者则是英国殖民者为了殖民统治的稳定而与当地的封建主——苏丹进行合作的产物，因此才会有9位苏丹轮流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发生。新加坡在和马来亚联合邦合并之前只是处于自治状态，并非独立的主权国家，尽管它也有政府和活跃的政党政治，1965年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的时候，它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不过它仍然承袭了英国式的多党议会制度，只是其虚位的元首位置上是总统而不是封建苏丹或国王。菲律宾的总统和议会模式几乎完全照搬自美国，在殖民时代结束的时候更换了称谓。印尼1945年独立的时候建立了总统内阁制，到1950年作为苏加诺和沙里尔妥协的结果改为议会内阁制，后来又被“有领导的民主”所取代，是东南亚国家在“民主实验”阶段内民主政治类型变更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民主制在东南亚国家的不稳定和多变特征很大程度上也和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初期阶段的主要动力有关。有人说，亚洲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较为优越这样一种认知。³笔者认为这种认知

2 (澳)梅·加·李克莱弗斯，周南京译，《印度尼西亚历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19—320页。

3 James Cotton, "East Asian Democracy: Progress and Limits," in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5 ~ 109.

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美国，而是对所有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政治制度。不过与其这样说，倒不如承认是这些国家新出现的民族主义在起着作用。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已经出现了“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概念，而泰国的民族主义在披汶第一次执政时期甚至张扬到“大泰族主义”的边缘。马来西亚联邦内的种族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李光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样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招致拉赫曼为首的马来统治者的一致反对。也许有人不同意民族主义竟然会成为东南亚国家民主化初始阶段的民主化动力这样一种说法，不过考虑到民族主义是那个时代东南亚国家唯一普遍具有的现代政治文化产物和当时社会生产力状况普遍低下的事实，这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笔者还认为，正是由于民族主义成为了该历史阶段民主化的动力，才导致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运行的不正常以及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抱有过高实用性的期待——民主制度似乎是造成宗主国与殖民地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憧憬民主的万能，仿佛建立了民主制度就能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当民族主义成为东南亚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发展动力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运行要么是被旧时代制度文化遗产所主导、承袭现成的程序民主实施套路并稍做修补，要么就是充满盲目热忱的试错过程。前者如马来西亚联邦（含新加坡）和菲律宾，民主制的运行一如殖民时代一样平稳，尽管马来西亚联邦的民主化进程被种族因素制约；而菲律宾在最初26年宪政民主中总统候选人叛党现象严重，且每一次大选都是美国的态度决定了最后的选举结果。相比之下，泰国的民主制在同保皇派斗争、防止复辟的同时落入了军人手中，而印尼在巩固国家独立的同时则出现了政府频繁更替的情况。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称1950~1957年间的印尼民主为“一种混乱的议会民主体制”。⁴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如果要用熊彼特那个关于民主的经典定义（即民主是一种方法，是政治家竞逐领导权的过程，本身并不是目的——作者注）作为民主制度的最低标准来进行衡量的话，选举民主在“民主实验”时期事实上都已经存在，而且比几十年以后的状况更接近于西方的标准。

当时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于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了类似的“民主实验”。缅甸在1948年独立后建立了英国式的议会政治，直到1958年议会政治出现危机，奈温为首的军人组成看守政府，接管政权一年半左右。印支三国也不例外：1956年南越吴庭艳政权形式上采用了美国总统制，实际上是家族统治，

4 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8页。

1963年后南越处于军人统治下。老挝在1956~1958年实行过短暂的多党议会民主。柬埔寨1955年大选后实行国民大会制度,但是1960年的宪法又恢复了国家元首“拥有君主权力和特权”的规定。在东南亚唯一例外的是文莱苏丹君主国。

在亨廷顿关于世界民主化进程第三波的理论中,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实验”毫无疑问应该归入“第二波”,不过亨廷顿并没有具体论及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笔者认为,对于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菲律宾和泰国而言,由于两国都建立过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为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都非常短暂,还是应该考虑将其算做兼跨民主化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国家。

② 东南亚国家初期民主制被威权政治取代的多重原因

比较泰、马、菲、新、印尼五个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初期发展状况不难发现,总体上看,除泰国以外,菲、马、新、印尼几国的“民主实验”过程均肇始于殖民地时代殖民者为巩固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更与这些国家民族意识觉醒、摆脱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相伴随。继承和移植的民主制在这五国初步确立后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并先后因故中止或迫于本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这一阶段均存在两党制的可能,然而由于种族因素的强大制衡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交缠,这种可能性最终被一党或政党联盟独大的局面所取代;印尼的民主制到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出台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宣告停止,随后又和泰国、菲律宾一样先后被军人专政所替代。泰国是上述东南亚五个国家里最早开始民主制也最早结束民主制的国家,菲律宾是这一时期东南亚民主制延续时间最长、最迟结束民主制的国家,而新加坡如果从1965年独立算起,则应该是最迟开始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实验”建立起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东南亚国家没有得以延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因国而异的,其共有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西方式民主制作为“继承或移植的民主”在东南亚缺少文化传统的支持。虽然东南亚在殖民时代开始之前已经是世界三大文明交汇的场所,然而儒家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几乎都是东方文明,而且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非常落后的前封建时期。以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和儒家文化为主的宗教信仰影响产生了两种相关的政治权力关系:封建王权和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庇护制,其共同点是对于家长式领袖权威的服从与依

附心态。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甚至延续到 21 世纪都没有改变，例如泰国 2006 年的军事政变就被国内外认为是获得了德高望重的泰国王的默认。在东南亚国家民主制度最初建立的时候，东南亚社会中最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文化就是民族主义了，因此约翰·卡迪说：“民主政府在东南亚能否扎根，甚至是个尚未决定的问题……民族主义一旦掌权，更可能用传统的政府形式而不是用外来的政府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世袭头领中天命君主统治的传统的基础已削弱的许多地区，民主政治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一党统治和专政可能是一种选择。”⁵

其次，是缺少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而引发的“合法性”问题。二战后初期到 60 年代，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较小，1960 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印尼 14%，马来西亚 18%，新加坡 18%，泰国 19%，菲律宾 28%。⁶ 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农村，城市居民比例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就更低了，以私有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中产阶级还远未形成。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党竞争制度完善，选民中普遍的文化程度也都很高，当这样的政治制度被移植到东南亚国家以后，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更何况这种制度的移植，无论是通过殖民者还是本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经历过大部分人民的斗争”。⁷ 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东南亚国家“民主实验”所建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其实是经由“民族主义”作为动力获得的合法性，并非“人民权力”的体现。采用这种政治制度的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无能与低效更加深了这种合法性的危机。

再次，是国际关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气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对于东南亚国家国内的政治斗争、社会稳定以及次区域国家关系均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对新建立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并且成为威权政治势力上台的直接借口。比如新、马合并时期政党斗争中有关亲共的左派与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引发的斗争以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印尼军队右翼势力镇压印共的“茉莉芬事件”以及苏加诺

5 约翰·卡迪：《东南亚的历史发展》，纽约，1964 年英文版，第 601 页。转引自贺圣达、王文良、何平著《战后东南亚的历史发展 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7-8 页。

6 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年，第 68 页。

7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年，第 110 页。

意在超越政党斗争的“有领导的民主”的产生，泰国披汶政权和菲律宾独立后的几任总统也大多追随美国的反共路线，菲律宾两党制的后台都是美国，其总统选举似乎成了美国导演的一出“民主”戏剧。

另外，东南亚国家初期的民主制度脱离了其政治现实，具有不容忽视的超前性缺陷。西方分权制衡的民主制虽然有扩大政治参与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优点，同时也存在权力分属、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对于刚立国的东南亚各国而言，大多数国家内忧外患，各种矛盾十分尖锐。相互交织的各种因素随时可能导致政权颠覆，国家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代议制度显得过于软弱。⁸在政治方面，东南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政治整合并实现政治稳定，“而议会民主制却使国家政治走向了愿望的反面，政治动荡与混乱大行其道，政治稳定成了泡影”。⁹此外，民族主义作为当时东南亚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不足以驾驭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非西方环境中的实践过程，而完全西化的政治理论又不能适应东南亚的社情国情”，¹⁰何况东南亚国家借用的政治体制本身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在战后的东南亚国家不仅没有发挥政治稳定和政治整合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本身也是造成社会政治生活失序和混乱的原因之一。¹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构架，为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长和张扬的环境，各方政治势力都希望掌握政权，结果是政府深陷于纷繁芜杂的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¹²

最后，在当时的东南亚社会中，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文化或民主道德普遍缺乏。这种民主文化或民主道德就群众而言，表现在参政热情方面；就政治家而言，表现在政党忠诚与国家忠诚方面。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党选举已经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民众对于民主选举态度冷漠，意欲当选的政客为当选不惜叛党，甚至出钱收买选票或动用军警等国家机器镇压群众的抗议活动，而已经当选的政客则出卖国家利益，听命于西方强国。这类情况在菲律宾最为严重，因此菲律宾虽然在这一阶段建立了完全符合美国标准的“两党

8 畅征、陈峰君主编：《第三世界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

9 张锡镇：《东亚：通向政治稳定之路》，收录于梁守德主编《国际政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10 龚敏：《浅析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东南亚受挫的原因——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角度的再思考》，载于《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4期，第52-56页。

11 陈峰君：《威权主义的概念与成因》，载于《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第68-73页。

12 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制”，并且维系了长达26年的民主状态，但是其民主制的质量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如果公民中没有民主的气质，那么民主的程序再完善也只能形同虚设”。¹³

综上所述，在东南亚国家民主化进程起始阶段，马、新、菲、泰、印尼五国虽然先后都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是总体上而言既没有解决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治整合的要务，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是纠缠于政党斗争之中，属于低效低能或无效无能的程序民主。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印尼在1950~1960年间先后出现8次内阁更迭，以至于后来苏加诺总结说：“这11年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所采用的民主是一种与印尼民族灵魂不相协调的民主，不是印尼的民主。”¹⁴在同样实行“民主实验”的缅甸，领导人吴努也曾在1960年时说：“政府的民主制度，虽然是最理想的，但同时也是最难实行的……民主是不能强加给一个民族的。民主的艺术原则必须适用于如当地的条件、信仰和习惯以及教育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意味着它是一个缓慢的逐渐成长的过程。”¹⁵因此，无论是如新、马那样转向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还是如泰、菲、印尼三国一样被军人威权政体所取代，东南亚国家在战后的“民主实验”或曰试行西方民主制的尝试都遭遇了准橘北枳的困惑，总之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民主实验”的失败说明在东南亚社会中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无法起到政治制度应该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同时，它的失败也成为东南亚国家威权政体建立的前提和直接诱因。

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又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经历了不少的风雨和变迁，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推翻了越来越独裁的军人政权或者寡头政治，群众的民主需求为威权政体画上了休止符，重新建立和稳固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即使由于种族因素导致政党政治特殊平衡状态的马来西亚也在2008年3月的大选中出现了40年不遇的新状况，而泰国政治则在2006年

13 俞新天：《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14 Herbert Feith and Lance Castles, ed.: *Indonesia Political Thinking, 1945—196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84. 转引自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意义与影响》，载于《北大亚太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

15 吴努：《亚洲人和民主》，载《缅甸每周公报》，英文，1960年11月24日仰光出版。转引自贺圣达、王文良、何平著《战后东南亚的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页。

军事政变后依然大致遵循政党相互竞逐的民主制竞选规则。然而民主政治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从由来至今都始终是一种舶来品，这种外来的政治模式能否被东南亚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接纳，融合革新出一种东南亚独有的民主政治文化，恐怕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分晓。无论如何，回首民主制度在东南亚国家最初建立阶段，与今天其民主制运行状况进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东南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曾经身处四大文明交汇处的东南亚地区来说，也许兼容并包、推陈出新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关，东西方政治文化交融出的新型民主政治形式就会在这片土地上发芽开花。

作者单位及职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副教授